

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的研究（續完）

新 華 書 局

五、上書的動機和目的

最後值得研究的，是 國父上書李鴻章的動機何在的問題。這一問題也是議論紛紛，歸納起來，有下列幾種不同的說法：

第一種說法——認為 國父上書是在勸李鴻章參加革命。這一說法是吳稚暉先生所編「中山先生年系」的「別傳」和上海「時事新報」報館所編的「中國革命史記」，均持此說（前已述及）



「盛世危言」著者香山人鄭觀應字陶齋（見右圖），國父曾託他設法見李鴻章。

第二種說法——認為 國父上書李鴻章，一方面是在藉上書之舉，以試探北方的究竟；另一方面是趁機使陸皓東親自看看北方的腐敗情形，絕了他仍希望滿清自行改革的心理。這一說法是吳稚暉先生在「總理行誼」一文中說的。他說：「今日存留的上李鴻章書，是他二十九歲（國父甲午上書時，為二十九歲，惟係前一年多執筆，故書中自謂二十八歲。）的手筆。所謂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，至今還是用得着作為建國的綱領，想見他當時研究政治術治道之至。他上書李鴻章，並不望李能替滿清實行。他是借此試探北方的究竟，且偕同志陸皓東同去，使他親見了北方的腐敗情形，絕他們仰賴滿清的希望。所以陸氏於明年（乙未），即能首先為革命在廣州盡義。」

吳先生此說是根據 國父自傳及陸皓東就義供詞中所說：「……吾方以外患之日迫，欲治其標，孫則主滿仇必報，思治其本。」（參看陸曼炎編「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文獻」）等而來的。

第三種說法——認為 國父上書李鴻章，

是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是較識時務的當政要員，如果李鴻章能採納的話，切實去做，對救國工作，必有所幫助。這一看法是陳少白先生在其「與中會革命史要」一書中所說（見前面引述）。還有鄒海濱先生的「中國革命史」也同樣持這種說法。他說：「迨紀元前十八年（甲午）又有中日戰役，總理謀所以挽救中國之策，乃偕陸皓東抵天津，致書於直督李鴻章，其主旨在人能盡其才，地能盡其利，物能盡其用，貨能暢其流，以立富強治國之大經大本。鴻章年已垂暮，無意事業，雖善其言而不能用。」以上兩位先生的說法都是說 國父想採取上書請願的方式，以達到救國的目的。

第四種說法——認為 國父上書是想得李鴻章的採納，則藉此進身，可以實行中央革命。這一說法是馮自由在「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」所持的觀點。

以上種種說法，均未作深一層的論釋，殆難獲得定論。因此對這個問題確實有加以審慎研討的必要。

我們認為 國父上書的動機是受到內外兩因素所促成。所謂外在的因素，即是受當時時勢的

影響；所謂內在的因素，即是受種族意識的驅策。由於外在環境而引發了國父的內在意識。

國父的內在意識，便是其種族革命觀念，因為有了這兩因素的湊合，遂引發國父上書的行動。

我們知道，清季自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後，外侮日亟，清廷頹頹無能，墮落腐化的弱點，已漸被揭露。但在列強的侵襲下，也漸有覺悟。知外人實有勝我的地方，非圖維新，實不足以自存。因是之故，自咸豐年間，開洋務之端。逮太平軍平定後，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左宗棠等，相繼上奏，請求革新，因而有新政設施。惟當時在朝大臣們，多猶囿於關閉自大的錮習，縱不公然持異議，實亦陰為阻梗。李鴻章自同治、光緒年間以來，儼然為改革運動之中心，然亦僭於大勢，未能放手全力進取。而且改革祇標「中學為體



香港西醫書院贊助人，兩廣總督李鴻章的照相。

，西學為用」，認為洋人的長處，只是在槍砲兵船方面，其他學術、政治遠不及中國，故改革運動，殆以「堅甲利兵」為限。初期的規模也甚狹隘，後來雖漸擴及郵電、交通、教育諸端，然猶以軍事為目標。故所謂講求「洋務」，實未曾探及西洋政治文化之精神所在，以致行之數十年，鮮有成效。新政徒存其名，內容還是甚為窳陋。

因此，國內有識之士，紛起倡議變法維新。有撰文主張維新救國者，有上書獻議變法圖強者，其中以光緒十四年（西元一八八八年）十一月十六日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，以布衣上書清廷，請釐革積弊，修明內政，取法泰西。繼此之後，蔚成風氣。

當時國父與各同志對於革命的進行方針，也曾經多次討論，約有以下各種途徑：(一)治本與治標（見陸皓東就義供詞）(二)急進與緩進（見胡去非著：總理事略）(三)中央革命與地方革命（見前馮自由記述）。急則治標，緩則治本，或兼行並進，要在審察當時形勢而靈活運用。

大家都知道，國父的革命思想是以救國救民為職志，為了要救國，所以國父主張以革命的方法，來推翻腐敗的滿清，建立一個共和政府。然而審察當時的革命形勢，單靠武力尚不足以舉事。再加上當時國內一般無識之士，咸倡議以和平漸進的方法，來改革內政。國

父在這彌漫着變法維新與上書請願的風氣影響下，不得不斟酌情勢，來運用革命的手段。蓋革命的手段，需要隨機應變，因時因地以制宜，如拘泥一式不變，對革命不但不利，反而有害。所以說，觀時乘變，對革命手段的運用，甚為重要。孟子也曾引用齊人的話說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」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國父鑒於國勢日蹙，民生日困，凡能達救國救民的手段，亦無妨採用。正如吳稚暉先生所說：「中山先生初不屑驟摧朽腐之滿洲，惟望革新而制夷。」這也是國父為順應當時國家的處境，而決定暫時試用的和平漸進之革命方法。國父在「倫敦被難記」中說過：「該黨原有見於中國之政體，不合時勢之所需。故欲以和平之手段，漸進方法，請願於朝廷，俾倡行新政，其最要者，則在改行立憲政體，以代舊式專制及腐敗的政治。」由上面這段話，可知上書請願乃國父權宜之計，實亦即「為生民請命」也。

國父在「革命思想之產生」（見國父全書第九二二頁）一文中也說：「我既自稱革命家，社會疑義紛起，多所誤會。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，究不過抱溫和主義，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，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。」又在「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」中也說：「日本維新，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。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。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。」（見國父全書第九七九頁）

由是可見國父認為革命與改造的意思是完全一樣。改造成功也就是革命成功。國父在「

改造中國第一步只有革命」一文說：「革命兩字，有許多人聽了，覺得可怕；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完全一樣。」（國父全書第七一六頁）

國父上書的動機，除受外在因素的影響外，其另一內在因素，便是受種族意識的驅策。國父早有種族革命的潛意識，因而引發他想法以種族意識激發李鴻章，希望他能為我大漢生民着想，共圖改革政治，以挽救中國。

國父為什麼選李鴻章作為他上書的對象呢？這是有道理的，因為李鴻章是漢人，而且李鴻章當時在清廷是很有影響力的，國父在上書以前，李鴻章已是滿清政府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。那時不僅洋務、海防由他主持，就是對外交涉也非他莫屬，可說是一位朝廷重臣。史學家梁啟超也寫了一本論李鴻章的專書，在書裏說：「四十年來，中國大事，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。故為李鴻章作傳，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筆力行之。」又說：「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，讀中國近世史者，勢不得不口李鴻章；而讀李鴻章傳者，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，此有識者所同感也，故吾今此書，名之為『同光以來大事記』可也。」（見論李鴻章頁一一三，台灣中華書局印行）梁啟超大都是批評人家的，很少說人好的，可是從他這段話，我們也可以看出李鴻章在滿清政府，確實是一位能左右朝政的關鍵人物。

李鴻章所辦洋務，以軍事和商務為主，雖然其「師夷技以制夷」的見解有偏失，但他知道時代在變，在當時士大夫中，還算是較識時務的當

政要員。而且李鴻章又是國父母校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，康德黎博士在第一屆畢業典禮的演說詞中也曾公開讚揚李鴻章。他說：「……各位亦知，李鴻章者，中國之俾斯麥也，伊對本院極愛護，……各位勿謂貴國之當局不信仰科學，彼極有權威的李鴻章氏，關於本院院務，曾復書述其意見，謂希望化學與解剖學，成為吾人欲為訓練之一特別部門等語。彼不似流俗之只說『

惠我奇方』，而欲以解雇運動，使成為赫胥黎或鄧德爾，彼謂『先予吾人以科學，則一切可隨之而至。』」（見羅香林「香港西醫書院之創設及其時代意義」一文）所以國父在上書前，對李的地位及其育士愛才的雅量却有了相當的認識。國父滿懷救國的心志，而且受到當時上書請願風氣的影響，因此在這種關係下，國父有此動機，乃人情之常。國父也曾說過：「中國睡夢至此，維新之機，苟非發之自上，殆無可望，此與中會之所由設也，與中會所以偏重上書請願等方法，冀萬乘之尊，或一垂聽，政府之或可奮起。」這些都說明國父以李鴻章為上書的對象，是希望他實行重大改革，這未嘗不是當時一條可行的救國途徑。

所以說，國父上書請願的行動，乃是順應當時之風尚及審酌革命情勢而決定的革命方法。這種革命方法的採用，並不是國父想藉此進身，而是想藉上書之舉，以促李鴻章的注意。國父除針對當時國家的需要，提出四語二十字的救國綱領，藉以表明其維新改革的目的，同時還在文中暗示李鴻章響應改造，共做這種「澤沛乎萬

民」的革命救國事業，所以說國父這種革命方法，是一種寄望不藉流血，而能達到革命目的之「革命」，亦可稱之為「中央革命」。據馮自由先生的記載和日本宮崎寅藏所著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一書，在庚子（一九〇〇）年間，國父正積極從事起義時，曾採納何啟、陳少白等同志建議策動李鴻章在粵宣告獨立，透過香港總督以促其成，國父曾借宮崎等由日赴港并允與李會晤，嗣以李鴻章北調，致事未成，此事經過雖尚待查證，但也可見國父在革命起義中，如有能以不流血方式達成目的，也願一試，上書李氏，當亦基於此一心理。

上面所陳述是國父上書的動機，現在試再就其上書的動機，所含蘊的目的，再詳細分為主要目的與附帶目的，來分別論述。

國父上書李鴻章的主要目的，前面已略有談及，國父是想藉這次上書，以促起李鴻章的注意和激發其種族意識，進而寄望他能響應改革運動，勿阻撓和迫害革命救國事業。

革命元老馮自由先生對國父上書的目的，曾有這樣的記述：「孫總理……及晤陳少白，乃出其任鄉所草上直隸李鴻章書稿，與少白斟酌字句，謂吾輩革命有二途：一為中央革命，一為地方革命。如此項條陳得李鴻章採納，則借此進身，可以實行中央革命，較地方革命為事半功倍，少白亦以為然。」由這段話，可想而知國父此時已決定其革命進行的方式，先從中央革命着手。但所謂中央革命，究何含意？所謂借此進身是否要求得一個官職，還是有其他含意？這有待研

酌。

一般人對 國父行中央革命的真正意義，沒有作深入的研究，以致誤解 國父上書的目的，是在求進身，以為進身才能實行中央革命。其實 國父所謂中央革命是另有其特別意義的，他所謂進身亦並非如一般人所說的做官。

試想 國父在上書前，已有醞釀籌組革命團體的趨向，甚至已到成熟階段，豈有在一夕之間，轉變他的革命思想而向清廷求官之理？設或 國父有此突變的想法，那他將如何對會黨及同道志士交代？並且他也不可能於同年（上書那年，即一八九四年）十一月，那麼快就能創組與中會於檀香山，此其一。再者，僅憑一篇上書而能被朝廷任用的可能性不多，此其二。另外， 國父也不可能想做清廷的官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可從 國父的西醫書院同學關心焉（景良）的追述，看出 國父的志向，並不是在企求做大官，而是要做大事（見 國父全書九四七頁「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」一文）。關氏追述說：「……至一八八九年， 總理的言論已充滿革命思想，要推翻清廷，廢除帝制。余母黎氏，時亦在該醫院任教英文翻譯職，平素善待總理，常邀到家中與兒輩同遊共食，待如家人。 總理生性活潑……余母見其言論激烈，嘗問云：『你志高大，想做什麼官？廣東制台嗎？』 總理答：『不。』『想做欽差嗎？』答：『皆不想。我只想推翻滿清政府，還我漢族河山，那事業比皇帝更高大了。』余母當時無民族和政治思想，乃以『孫悟空』目之。」（關氏號「景良」與國父同學，

後 國父一年畢業，曾與 國父、少執、少白、鶴齡等合撮一照） 國父民國肇建後，讓位袁世凱的做法證諸此一軼事，使我們對 國父偉大的革命志向，益增瞭解。

還有， 國父對清吏印象不佳，豈有欲求做滿清官吏之理！關於這點，我們也可從 國父在「倫敦被難記」，批評清吏的話，來推想 國父並不是一個想做清吏的人。他說：「至中國現行政治，可以數語概括之曰，無論為朝廷之事，為國民之事，甚至為地方之事，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。其身為官吏者，操有審判之全權，人民身受冤枉，無所籲訴，且官場一語，等於法律。上下相礙相結，有利則各飽私囊，有害則各委其責任。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，賣官鬻爵，賄賂公行……至官場俸額之微，真非英人所能夢及。如兩廣總督所治區域，人口之衆，過於全英，然其一歲俸祿，合英金六十鎊而已。所以一行作吏，即以婪索及枉法為事。」足見 國父不祇無此意圖，而且不屑做清廷之官吏甚明。

不過，何以 國父書中有「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，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，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，故不自知其驚下，而敢求知於左右者，蓋有慨乎大局，篤目時艱，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。」的話，乍見之下，似有求官之嫌。其實，這是祇從文字表面觀察，所造成的錯覺。

大家都知道，任何一篇文章都應該有一個中心思想。 國父這篇「上書」的中心思想，除了提供李鴻章實行這四大救國綱領外，還表明他救國濟世的意願，那就是他願意從事於農桑大政的

工作，因為這種工作很重要，於國計民生，大有裨益。所以， 國父說：「欲躬行實踐，必求澤之沾沛乎萬民者。」

國父想躬行實踐的是那「澤沛乎萬民」的農桑大政，其實就是革命救國事業。因為革命救國事業，也就是在求全民的幸福，如同農桑大政，可蘇民困一樣。 國父以興農桑大政，作為隱辭，來說服李鴻章能採納他的主張，同意革新農政，藉以暗示他響應種族革命。所以 國父說：「非欲徒撰空言，以瀆清聽，自附於干誥者流，蓋欲躬行而實踐之，必求澤沛乎萬民者也。」又說：「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。」 國父如此做，積極方面是要李鴻章響應種族革命；消極方面就是在使他不要阻撓和迫害「澤沛乎萬民」的革命救國事業，這也可以說是在防止「當道不能保護，反而為之阻遏」的事件發生。

國父如何激發李鴻章的種族意識，而促其響應種族革命呢？從這篇書中的一段話，便可說明這點。書云：「竊嘗聞之，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，嘗居為之焦，舌為之敝，苦心勞思數十餘年，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，津關之一路。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，任寄股肱，而又和易同衆，行之尚如此其艱，其他可知矣。中國有此膏育之病，而不能除之，則堯舜復生，禹皋佐治，無能為也，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？此志士之所以灰心，豪傑之所以扼腕，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，而匿跡於醫術者，殆為此也。」上面這段話，提到李鴻章行新政，尚感如此的困難，以激發他對昏聩的宮廷起憤恨之心，同時也使他了解宮廷歧視漢

人的不平待遇，以啓迪他的種族革命意識，這也就是暗示李鴻章，假若有志圖強救亡的話，則須另起爐灶，決不能再存望於宮廷，就如同他經營海軍、鐵路等所遭遇的困難一樣。現宮廷已病入膏肓，如不「改造」的話，想行新政，就是像堯舜復生，禹臯那樣的忠賢來輔佐，也難有作為，這也是志士豪傑最感灰心的。因此，寄望李鴻章也能贊同其振興農政的主張，進而響應改革運動。

國父攜萬言書北上前，已和會黨首領鄭士良互通聲息，佈署會黨就緒，同時也想策動駐屯廣州清軍防營，冀能在其北上遊說李鴻章時，倘獲其採納和贊助，以謀在內部建立呼應關係，從事政變，那是輕而易舉的事。國父在自傳中曾說：「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。」所以說，國父所謂「其欲行中央革命，以達事半功倍之效」的真正涵義，亦即在此。此外，國父上書除主要目的外，也附帶有其他目的，以備主要目的未能達成時，可獲致其附帶目的的效果，這便是國父未雨綢繆的作法，也是他高人一籌的地方，即他能見人之所未見，行人之所未行，充分表露他高瞻遠矚的智慧。

國父的附帶目的可分兩點說明：第一是藉上書之舉，以爲日後進行革命鋪路。國父對此次上書李鴻章，早作試探性質，如果能獲得李氏的採納和贊助，當然最好，可內應外合，起事政變。但如未蒙採納，亦不挫折他的革命志向。我們從國父於同年（上書那年）十一月在檀香山遠組革命會黨的行動，即可推想國父寄望李鴻章的心理不大，已早作事敗後下一步驟的打算，這

下一步驟的打算，就是他的附帶目的——即安排他此後進行革命工作鋪路。

先談國父如何爲日後革命工作鋪路。國父在這篇上書中，談到他欲發展農政，此固然是國父看重農業，但也是他用來掩護其日後的革命活動。如書中所云：「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，考究蠶桑新法，醫治蠶病，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，觀其農事。」這段話證諸於國父那年在檀香山創組興中會，及翌年（一八九五年）十月六日，創立農學會等革命組織，很明顯的已準備了掩護革命活動的工作。

國父爲什麼要選擇以發展「農政」爲掩護呢？這是有道理的，因爲國父出身農家，對農稼之事，耳濡目染，頗有心得。他說：「文之先人躬耕數代，文於樹藝牧畜諸端，耳濡目染，洞悉奧竅，泰西理法，亦頗有心得。」其次是因四民之中，以農民佔絕大部份。國以民爲本，民以食爲天，農桑大政，爲生民命脈之所關，不容忽視。而且發展農政爲利國益民的大事業，比諸革命事業可說是最恰當的了。再者，國父鑒於朝廷推行洋務，惟對農政一事，未聞仿行，以致農村景況，大遜曩昔，農民生活，日趨困苦，所以欲謀富強，不得不振興農業。國父以發展農政，解決農民生活，視同挽救國家一樣的重要，以此來號召國民，更易獲得羣衆的同情和響應，可見國父以發展農政，作爲掩護革命是有其理由的。

國父在書中有「中堂有以玉成其志」的話，便是希望李鴻章贊助他，也就是暗示李鴻章由贊助進而響應其欲躬行實踐「澤沛乎萬民」的種族

革命，以挽救國家。

國父上書的附帶目的，在乙未年（一八九五年）廣州之役，曾收到很大的效果。國父創立農學會，一方面是在倡導振興農事之研究，另一方面也作爲他聯絡會黨、掩護革命活動的祕密機關。如果沒有在「上書」中種下了因，何能做到掩飾清吏耳目之果呢？所以說，這是國父上書的附帶目的。有關農學會活動的史實，馮自由先生在「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」中有這樣的記述：「興中會總部（在香港）決議在粵大舉後，孫總理即偕鄭士良、陸皓東、陳少白、鄧蔭南等赴廣州設立分會，租得雙門底王家祠雲岡別墅爲會所。外假農學會名義，以掩飾外界耳目。由總理手訂農學會章程若干條，極言中國非研究農學，振興農業，決不足以致富強之理，語極動聽，粵中官紳潘寶璜、潘寶琳、劉學詢等署名贊助者數十人，無有疑爲挾有危險性質者。……在粵機關成立之後，同志加入興中會者，較香港尤爲踴躍。」由這段話，我們可領會國父上書的附帶目的，確實已收掩護革命活動之效果。

還有，國父在乙未年舉義失敗後，能倖免於難，一方面是他自己膽略過人，另一方面還是託了甲午上書之福。因在舉事消息走漏後，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，曾以國父舉事造反之事，稟報粵督譚鍾麟，但譚未予遽信，他認爲「國父乃教會中人，好作大言之狂士耳，其創農學會，李少帥且贊助之，焉敢造反？」所以未敢貿然採取拘捕行動，使國父乘時得以脫逃。（參閱鄒魯著「中國國民黨史稿」第三篇乙未廣州之役）

第二是 國父想藉上書之舉，以揭示他的政治主張，同時改正一些同志的見解，這是他的另一附帶目的。國父爲了要開導一些同志對革命的了解，藉以堅定其意志，及心甘情愿信服革命目標起見，不得不假上書之舉，揭示其主張，俾會黨同志認識革命目標。

再有一些同志咸以國家外患日急，應該先謀挽救危亡，故主張治標，希望清廷能自行圖強，如陸皓東等一些人都有這種想法。 國父爲了要糾正這些同志的寄望心理，不得不因應時勢，作

了一次和平革命試探，俾從上書請願的實際行動，獲取經驗，藉能糾正一些仰望清廷維新的寄望心理。故在北上行時，偕陸皓東同行，一方面是因陸氏對上海、長江一帶的地勢較爲熟悉，另一方面就是藉此探視京師虛實，使他看看北方的腐敗情形。陸氏經此一行後，不但改變其望治心理，而且更增強其革命排滿的信念。所以在乙未廣州一役，陸氏成爲中國有史以來，爲共和革命犧牲的第一人。國父這次北上之行，雖然沒有達到主要目的，但却也達成了不少附帶目的，不但無損

於革命事業，反而更積極的推動中國革命。所以說，國父上書之舉，其意義重大，影響深遠，實在不容我們忽視，更不應該有所誤解。

以上我們已就 國父上李鴻章書的經過和有關問題，根據各項資料，作較有系統的探討，所論雖多爲個人意見，但相信可供各方的參考。對這一文獻的背景和經過有了深切的瞭解，固然可使我們對這一文獻有更正確和深入的認識，當也有助於我們對 國父革命思想發展過程的研究和發揚光大。

「三民主義的比較研究」自序

陶懷仲

讀過先師任卓宣教授的「三民主義比較研究」一書，引起了我的興趣。三民主義比較研究，在學術界，雖已不陌生，但在此以前，實未有過系統的研究。任教授的「三民主義比較研究」一書，實爲國內，第一次系統的研究。其內容豐富，論點明確，且多有創見。其研究之方法，亦極爲科學。其研究之範圍，亦極爲廣泛。其研究之結果，亦極爲詳盡。其研究之價值，亦極爲重大。其研究之貢獻，亦極爲顯著。其研究之影響，亦極爲深遠。其研究之地位，亦極爲重要。其研究之意義，亦極爲重大。其研究之價值，亦極爲重大。其研究之貢獻，亦極爲顯著。其研究之影響，亦極爲深遠。其研究之地位，亦極爲重要。其研究之意義，亦極爲重大。

共四十五萬字以上。復經修正、補充及潤飾，希望言之有物，證據充分，成爲一學術論文。其內容，則以三民主義之比較研究爲中心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。其內容，則以三民主義之比較研究爲中心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。其內容，則以三民主義之比較研究爲中心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，而以孫中山先生之革命實踐爲背景。

恩列斯(8)社會主義理論部份，特將影響較大之科學社會主義及蘇維埃主義提出，詳加比較。此書之特色，在於其研究之方法，極其科學，其研究之範圍，極其廣泛，其研究之結果，極其詳盡，其研究之價值，極其重大，其研究之貢獻，極其顯著，其研究之影響，極其深遠，其研究之地位，極其重要，其研究之意義，極其重大。其研究之價值，極其重大，其研究之貢獻，極其顯著，其研究之影響，極其深遠，其研究之地位，極其重要，其研究之意義，極其重大。